

# 川东教案的运行态势研究

李重华

(重庆社会科学院 文史研究所,重庆 400020)

**摘要:**晚清教案四川居多,尤以川东最多最严重。经年累月,间见层出、无处无之、“一夫夜呼,狂走相应”、视生命财产如儿戏、动辄兵戎相见以及“祸局未终,外交已起”,就是川东教案的运行态势。考察川东教案的运行态势——目前还没有人关注这个问题,将使人们对川东教案的全貌,特别是其严重性有进一步的印象。

**关键词:**晚清;川东教案;运行态势

**中图分类号:**K25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2)06-0158-08

运行就是周而复始地运转,态势即状态和形势。教案四川居多,尤以川东——大致相当于今重庆市<sup>①</sup>最多最严重,川东实教案高发区或曰重灾区,川东教案就是晚清教案的缩影,考察川东教案的运行态势——目前还没有人关注这个问题,将使我们对川东教案的全貌,特别是其严重性有进一步的印象。

## 一、经年累月,间见层出

据台湾学者陈银昆统计,1860年到1899年,共发生811起教案,四川以117起居首位<sup>[1]4,24</sup>。据隗瀛涛、王笛统计,1861年到1910年,四川共发生127起教案,其中,重庆府以33起居首位,酉阳直隶州12起,夔州府4起,忠州直隶州3起,川东两府两直隶州52起,而成都府、资州和打箭炉厅等其余18个府直隶厅州75起<sup>②</sup>。实际上,川东仅重大教案就有12起,一般教案61起,这还不算尚待进一步查证的15起大足教案和一些特殊教案。

如果从1860年或1861年算起,则1861年大足教案<sup>[2]1151</sup>、石碛教案、涪州教案以及长寿教案就是晚清四川最早的一些教案<sup>[2]1131-1132</sup>。此后,川东教案,特别是大案一直不断,计有1863年重庆教案、1865年酉阳教案、1868年酉阳教案、1873年黔江教案、1876年江北教案、1876年涪州教案、1886年重庆教案、余栋臣第一次起义、1898年江北教案(医馆案)、余栋臣第二次起义、1901年綦江教案以及1907年开县教案。也就是说,在陈银昆所谓晚清民教冲突的各个时期<sup>③</sup>川东都有重大教案发生,而四川其他区域只有1895年成都教案以及1905年巴塘教案。在晚清教案始发地江苏,自1891年长江教案后再未发生重大教

收稿日期:2012-06-17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科规划项目“封闭状态下的激烈冲突”(2008076)

作者简介:李重华(1962-),男,甘肃泾川人,重庆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政治史研究。

①本文所谓川东并未包括晚清川东道之全部,即并不包括重庆府之定远县和绥定府城口县以外各县,却包括川北道潼川府之遂宁县,因为遂宁花岩场也发生过教案,而花岩后归民元始置之今重庆潼南县。

②隗瀛涛、王笛论文《西方宗教势力在长江上游地区的拓展》,《历史研究》,1991年第3期;隗瀛涛专著《巴蜀近代史论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0、54页。

③1860—1874年为第一期,1875—1884年为第二期,1885—1899年为第三期,《清季民教冲突的量化分析》,第4页。

案<sup>[3]237,240</sup>。而川东就是到1907年,“开县承红灯教之余孽,教会辄遭焚掠”<sup>[4]</sup>,也是一起重要教案,在李时岳《反洋教运动》一书中,四川最晚的“闹教”事件即此次开县教案<sup>[5]96</sup>。

陈银昆认为,如果其他情况相同,则持续时间越长,案件越严重,如果以大型事件为标准,晚清663起教案的83.86%发生在1天甚至几小时或几分钟以内<sup>[1]17-18</sup>。而川东教案动辄成年累月,按时间论,1863年重庆教案3天<sup>[2]1191</sup>,1886年重庆教案20多天<sup>[6]984</sup>,1876年江北教案至少三四个月<sup>④</sup>,同年涪州教案半年<sup>[7]1192</sup>,1865年酉阳教案7个月<sup>[2]1221</sup>,余栋臣第二次起义10个月<sup>[8]80,98</sup>,余栋臣第一次起义断断续续两年<sup>[9]1478,1608</sup>,1868年的酉阳教案也有两年<sup>[10]1080,1122,1169-1175</sup>,1884年綦江教案这样一起普通教案亦持续数日<sup>[11]17</sup>。

戚其章、王如绘《晚清教案纪事》一书汇集48起重大教案,而同一个地方连续发生大案者除南昌外就只有重庆、酉阳和大足。事实上江北大案也不止1876年教案一案,1898年教案(医馆案)有人命,“各国领事竞起为难”<sup>[12]740-741</sup>,也是一起重要教案。而且不管是连续发生还是未发生大案地方,都还有一些一般教案发生。

有些人可谓职业反教领袖。两次酉阳大案,张佩超均被控为主使,以致1868年酉阳教案后被逐至湖北<sup>[10]1164,1232</sup>。余栋臣在发动两次起义前,1888年大足教案已成为主角<sup>[9]1496</sup>,第二次起义失败后被“押解

到省,著永远牢固监禁”<sup>[12]852</sup>。白绍庚是1876年江北教案反教领袖之一,也是1898年江北教案(医馆案)反教领袖之一<sup>⑤</sup>。

## 二、无处无之

据台湾学者林文慧考察,福建教案以闽南为多,占47%,闽西无教案<sup>[13]214</sup>。在隗瀛涛和王笛的统计中,龙安府、茂州和叙永厅也没有教案。而川东各地几乎程度不同地都发生过教案。

重庆府教案。重庆,包括巴县,除1863年和1886年两次大案,在1862年、1876年、1895年、1896年、1899年、1900年、1901年、1902年、1907年、1909年和1910年还发生过14起教案<sup>⑥</sup>。大足除余栋臣两次起义两次大案,在1861年、1886年、1888年和1899年还发生过教案<sup>⑦</sup>。江北除1876年和1898年(医馆案)大案,在1874年、1879年、1886年和1898年(响应余栋臣案)还发生过教案<sup>⑧</sup>。涪州除1876年大案,在1861年还发生过教案<sup>[2]1131-1132</sup>。长寿除1861年教案、1899年教案,还响应过1876年江北教案<sup>⑨</sup>。綦江在1884年和1901年都发生过教案<sup>[14]693-698</sup>。永川除1894年教案,还响应过余栋臣第二次起义<sup>⑩</sup>。合州除1869年教案,还响应过1876年江北教案和余栋臣第二次起义<sup>⑪</sup>。荣昌既响应过1876年江北教案,也响应过余栋臣两次起义<sup>⑫</sup>。璧山既响应过1876年江北教案,也响应过余栋臣第二次起义<sup>⑬</sup>。铜梁既响应过1886年重庆教案,也响应

④1876年4月7日(光绪二年三月十三日)开始,按教会提供的材料,大规模的烧杀抢掠一直持续到光绪二年五月上旬,零星的反教行为甚至见诸闰五月到八月。《教务教案档》第3辑第2册,1975年版,第1135-1172页。《清末教案》第4册,2000年版,第396页。

⑤《教务教案档》第3辑第2册,第1172页,刘吉西等《四川基督教》,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486页。

⑥1862年、1876年、1896年、1899年、1901年、1902年、1907年各教案分别见四川省档案馆《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28页、第377-378页、第48-76页、第547-548页、第690页、第142-143页、第146-147页。1895年、1909年、1910年各两次教案依次见《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第478-479页、第490-491页、第150页、第156页、第163页、第166页。1900年教案,陈攸序《袍哥唐廉江与辛亥重庆“反正”》,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辛亥革命回忆录》第7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351-352页。

⑦1886年教案,《教务教案档》第4辑第2册,第984页。1888年教案,《教务教案档》第5辑第3册,第1516页。1899年教案,李永翘《爱国画家张善子先生传略》(一),《四川地方志通讯》1985年第1期。1940年10月,在接受《益世报》记者采访时,张善子自己不无夸耀地说:“四五岁时我固然常到天主教堂去玩,但十七八岁时,我却曾带领了二百余青年,打教堂,著名的大足教案便是我闯下的。”《虎痴访问记》,《益世报》1940年10月6日。

⑧1874年教案,《教务教案档》第3辑第2册,第1004页。1879年教案,《教务教案档》第4辑第2册,第770-771页。1886年教案,《四川基督教资料辑要》,第482页。响应余栋臣第二次起义,《大足人民反洋教斗争》,《大足文史资料选辑》(二),第88页。

⑨1899年教案,《教务教案档》第6辑第2册,1980年版,第1305页。响应1876年江北教案,《教务教案档》第4辑第2册,第759页。

⑩1894年教案,《教务教案档》第5辑第3册,第1638页。响应余栋臣第二次起义,《教务教案档》第6辑第2册,第1276页。

⑪1869年教案,《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第299-300页。响应1876年江北教案,《教务教案档》第3辑第2册,第1123页。响应余栋臣第二次起义,《教务教案档》第6辑第2册,第1274-1275页,第1267页。

⑫响应1876年江北教案,《教务教案档》第3辑第2册,第1228页,第4辑第2册,第760页。响应余栋臣第一次起义,《教务教案档》第5辑第3册,第1457页。响应余栋臣第二次起义,《教务教案档》第6辑第2册,第1258页。《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第518-519页。

⑬响应1876年江北教案,《教务教案档》第3辑第2册,第1228页,第4辑第2册,第760页。响应余栋臣第二次起义,《教务教案档》第6辑第2册,第1276页。

余栋臣两次起义<sup>⑭</sup>。南川响应过1876年江北教案<sup>⑮</sup>。江津响应过余栋臣第二次起义<sup>⑯</sup>。定远今属四川,也响应过余栋臣第二次起义<sup>[15]1329</sup>。这就是说,重庆府所属都发生过教案,且集中了四川绝大部分大案。

夔州府教案。除1907年开县教案外,1895年万县发生教案<sup>[9]1725-1726</sup>。奉节除1908年教案,还响应过余栋臣第二次起义<sup>⑰</sup>。1890年7月,“奉节、巫山、云阳一带,有以匿名揭帖沿路张贴,毁谤西人者”,法国天主教川东副主教白德理要求查禁<sup>[14]328</sup>。只有大宁,即今巫溪县没有发现反教行为。

忠州直隶州教案。丰都除1864年教案外,还响应过1876年江北教案<sup>⑱</sup>。梁山即今梁平,1900年发生教案<sup>[14]669</sup>。垫江响应过1876年江北教案<sup>⑲</sup>。忠州无教案之名,有教案之实<sup>[14]320-321</sup>。

酉阳直隶州教案。酉阳除1865年和1868年两次大案外,1863年、1864年和1876年还发生过教案<sup>⑳</sup>。黔江1873年发生大案。彭水在1864年、1869年、1876年、1901年和1911年都发生过教案<sup>㉑</sup>。秀山除1868年教案,还响应过1876年江北教案<sup>㉒</sup>。州属全都发生过教案,并有3次大案。

石碛直隶厅在1861年发生教案<sup>㉓</sup>。

绥定府所属城口厅未发生教案。

1874年6月,川北道潼川府遂宁县花岩场发生教案。由于花岩场后归民元始置之潼南县,此次遂宁教案也可视为潼南教案<sup>[7]1091</sup>。今武隆时属涪州,1876年涪州教案染之<sup>[7]1192</sup>。

可见,川东只有大宁和城口未发现任何反教行为。换言之,在今重庆市范围内,只有巫溪和城口未发生教案。

### 三、一夫夜呼,狂走相应

陈银昆认为,如果其他情况相同,参与人数越多,显示教案越严重。依其大案统计法,663起教案中的43.14%为10人以内之小案件,其中,仅1人者达11.76%,可见大部分教案公众所受感染不大<sup>[1]72-73</sup>。而川东教案动辄成千上万人参与。

1863年重庆教案,陈桂林等“纠结兵勇痞匪约计千余”分队四扰,劫后演戏治酒,“每日设席百桌”<sup>[2]1167-1168</sup>。1865年酉阳教案,冯仕银、张佩超等“督率数百人”掳掠城乡教民,“各街传闹如狂”<sup>[2]1221</sup>,“几于阖邑风从”<sup>[10]1054</sup>。1868年的酉阳教案,先是1867年4月,“彭匪”庾元双等人“统带千余人”到酉阳捆捉萧教士至火石垭,并烧抢教民<sup>[10]1203</sup>,1868年5月,传教士覃纯卿“发所蓄养匪徒千余人”至张佩超家报复,1869年3月到4月,又“带领黔省在逃叛逆李志高及徐、庾、周、张各匪二千余人”在核桃园等地奸淫掳掠<sup>㉔</sup>。1876年涪州教案,打教队伍“数千,头裹红白巾”,拥至州城打毁教堂、教民房屋<sup>[7]1192</sup>。余栋臣第一次起义,“振臂一呼,聚者数千”<sup>[16]大事记</sup>。1886年重庆教案,50余团3000余人至白果树教堂“滋事”<sup>[6]988</sup>,教案开始那天,甚至有约10000人参与<sup>[17]162</sup>。1876年江北教案,陈子春等“纠集四十八场痞党数千有奇”,拥署请示打教<sup>[7]1133</sup>。余栋臣第二次起义,不到10天即募6000余人的队伍,最多时有万人,被陈银昆视为6个数万人参与大案之一<sup>㉕</sup>。1898年江北教案(医馆案),“城乡团众齐至”<sup>[12]740</sup>。1907年开县教案,“数日裹胁众至数千”<sup>[18]966</sup>。所以,像1873黔江教案这样的大案,100多人“撞遇”传教士<sup>[7]996</sup>,实为罕见。甚至一些一般教案,如1879年江

⑭响应1886年重庆教案,《教务教案档》第4辑第2册,第984页。响应余栋臣第一次起义,《教务教案档》第5辑第3册,第1457页。响应余栋臣第二次起义,《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第522-525页,第528页。

⑮《教务教案档》第3辑第2册,第1228页,第4辑第2册,第760页。

⑯《教务教案档》第6辑第2册,第1328页,第1276页,《民国江津县志》卷三,清。

⑰1908年教案,《重庆宗教》,第261-262页。响应余栋臣第二次起义,《教务教案档》第6辑第2册,第1279页。

⑱1864年教案,《教务教案档》第1辑第3册,第1203页。响应1876年江北教案,《教务教案档》第3辑第2册,第1228页,第4辑第2册,第760-761页。

⑲《教务教案档》第3辑第2册,第1228页,第4辑第2册,第760页。

⑳1863年教案,《教务教案档》第1辑第3册,第1204-1206页。1864年教案,《教务教案档》第2辑第2册,第1201页,响应1876年江北教案,《教务教案档》第3辑第2册,第1228页。

㉑1864年教案、1869年教案,《教务教案档》第2辑第2册,第1175-1177页。1876年教案,《教务教案档》第3辑第2册,第1228页,第4辑第2册,第760页。1901年教案、1911年教案,《四川基督教资料辑要》,第536-537页。

㉒1868年教案,《教务教案档》第2辑第2册,第1172页。响应1876年江北教案,《教务教案档》第3辑第2册,第1228页,第4辑第2册,第759页。

㉓《教务教案档》第1辑第3册,第1131页。而教会称,石碛抓住4个教民殴打,《教务教案档》第1辑第3册,第1133页。

㉔《教务教案档》第2辑第2册,第1225-1226页。覃纯卿,《晚清教案纪事》第63-67页作“谭纯卿”,有误。

㉕不到10天募6000人,《大足人民反洋教斗争》,《大足文史资料选辑》(二),第81页。最多时上万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1期,第135页。陈银昆把它视为数万人参与之案件,依据即波及28州县,《清季民教冲突的量化分析》,第73页。

北教案,牵动“四乡”<sup>[6]771</sup>。

陈银昆认为,教案通常呈“点”状分布,一旦表现为“面”,即意味着很严重,“面”越宽越严重,依其统计,663起教案中的97.44%仅限于1县之内,甚至几平方公里<sup>⑥</sup>。而川东教案却多呈“面”的表现。

1865年酉阳教案,在法国公使柏尔德密看来就是1864年冬彭水教案“蔓延至于酉阳”的结果<sup>[2]1217</sup>。而1868年酉阳案发,彭水又“匪类蜂起”<sup>[10]1176-1177</sup>。1886年重庆教案,“铜梁大足等处纷纷打毁”<sup>[6]984</sup>。余栋臣第一次起义,荣昌被“攻击”,铜梁被“抢掠焚毁”<sup>[9]1457</sup>。1876年江北教案,波及涪州、巴县、南川、荣昌、璧山、垫江、长寿、丰都、酉阳、彭水和秀山,“甚至殃及川北邻水内江等处”<sup>[7]1228</sup>。余栋臣第二次起义波及全川37州县和1个土司<sup>⑦</sup>,这还不算湖北长乐、利川、长阳、巴东,湖南澧州<sup>⑧</sup>以及“滇匪”彭大川的响应<sup>⑨</sup>。此外,1907年开县教案也是“扰及三县”<sup>[18]967</sup>。所以,吕实强在论述1863年和1886年重庆教案时就认为其规模之大,不论参加人数,打教范围,还是持续时间,除贵州外,其他地方“均罕与伦比”<sup>[19]469</sup>。

此外,教案“前呼后应”之势甚烈。1886年重庆教案明确表示“学江北那年打出打进”<sup>⑩</sup>。余栋臣第一次起义檄文历数“酉阳打于前,贵州杀于后,白果巷夺其巢穴,重庆府毁其房廊。江北创先陈子春,马跑受害雷健候”<sup>[20]123-124</sup>,显示重庆教案、酉阳教案、江北教案、大足本地教案以至贵州教案影响的痕迹。余栋臣第二次起义,1898年3月江北教案反教领袖之一的袁海山进言,“君能幸免官兵剿杀者,无非有华芳济在耳。若芳济朝出,则大兵夕至”,余栋臣遂坚不合作<sup>[14]511-512</sup>。

#### 四、视生命财产如儿戏

陈银昆认为,一起教案可包括一个或一个以上之行为方式,这样,可得教案的行为方式1474次,其中,生命损失132次,财产破坏510次,无生命损失亦无财产破坏832次,132次生命损失共死亡3563

人,含平民1903人,教民1598人,外国传教士及其眷属56人,中国传教士6人,“生命损失一项,因人命关天,最能代表教案之严重程度”<sup>⑪</sup>。

而生命损失大部来自川东。1868年酉阳教案,平民死亡1620人,教民死亡476人<sup>[1]63</sup>,并杀死法国传教士李国。其他各大案,1863年重庆教案,杀死教民刘金光<sup>[2]1167</sup>。1865年酉阳教案,杀死法国传教士邓某房东何魁和法国天主教川东副主教玛弼乐<sup>[2]1221</sup>。1873年黔江教案,杀死法国传教士余克林和传教士戴明卿<sup>[7]996</sup>。1876年江北教案,“命案二十六起”,同年涪州教案,“命案十六起”<sup>[7]1350-1352</sup>。1886年重庆教案,11个平民和1个营勇死亡<sup>[6]989</sup>。余栋臣第一次起义,“教民报称被杀十二命”<sup>[9]1572</sup>。1898年江北教案(医馆案),杀死教民唐希夷<sup>[12]740</sup>。余栋臣第二次起义,仅华芳济记载,劫持他时就杀死其厨师及一教民,后来,又杀死传教士黄用中和其助手唐某、一新婚男子、一“半受洗”者、“一吸烟人”、大足教堂厨师以及荣昌某<sup>[14]518-528</sup>。甚至1864年彭水教案,“杀毙刘教士等数人”<sup>[10]1176</sup>。1899年长寿教案,“杀害安分教民一人”<sup>[15]1305</sup>。1900年梁山教案,教民陈万来殒命<sup>[14]669</sup>。1908年奉节教案,传教士丁大升遇害<sup>[21]261</sup>。此外,1874年遂宁(潼南)教案,教民范洗信与胡有绿被杀<sup>[7]1091</sup>。总之,即使除去梁山与奉节两案,川东教案生命损失已占132次教案生命损失的1/10,中国传教士的50%,总人数的一大半,这还不包括官军弹压教案时的杀戮——余栋臣第一次起义,拾万场一战,“阵斩匪党三十余人”<sup>[9]1608</sup>,余栋臣第二次起义,官军攻打玉龙时,“村中居民不及避,被戮多多,遗尸一百三十三具”<sup>[14]528</sup>。开县教案,“官兵涪至,杀人数百”<sup>[4]第1期</sup>。而江苏教案,除了初期有一法教士被杀外,皆未发生命案<sup>[3]239</sup>。

杀人手段极其残忍。1863年重庆教案,杀死刘金光,“报验领埋,又被恶等抄尸剥衣,抛露骸骨”<sup>[2]1167-1168</sup>。1876年江北教案,“斩决唐昌久,炮烙

⑥《清季民教冲突的量化分析》,第19-21页。他在第21页表中所用统计单位是县,但当页文字说明是州县并列,第11页关于教案的单位问题,也说明“通常仅以一州县为限”。

⑦吕实强:《义和团变乱前夕四川省的一个反教运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9年版,第122页。陈银昆认为余栋臣第二次起义波及28州县,且只有此案与1895年成都教案波及28州县,《清季民教冲突的量化分析》,第21页。

⑧两湖响应余栋臣第二次起义的一些情况,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7辑《张文襄公(之洞)全集(电牍)》三十六,文海出版社,第11257-11278页。

⑨两湖响应余栋臣第二次起义的一些情况,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7辑《张文襄公(之洞)全集(电牍)》三十六,文海出版社,第11257-11278页。“滇匪”彭大川的响应,祝世德《民国续修筠连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36辑,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601页、第576页。

⑩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China, Embassy and Consular Archives, Correspondence, F. O. 228:961.

⑪依陈银昆综合统计,《清季民教冲突的量化分析》,第59-64页。

黄节耀、冉伍氏,支解董大顺。见涕淋,闻胆裂”<sup>[7]1134</sup>。余栋臣第一次起义,有10个教民被“将尸身支解”<sup>[9]1452</sup>。1868年酉阳教案,教民王学顶等人将段玉阶“磔为万段”,把何廷宴倒悬树上,多人“各较一炮”,以刀点心,“复截其头首,剃其四肢”,另有20人备极捶楚之后,亦遭“骈戮丢坑”。1869年1月2日,“杨贞廷手截李教士之头,抛掷火中”。同年3月到4月,覃纯卿伙同李志高报复,支解秦心元等6人,灌油点灯黄老万,复“杀死二百余人,尽行剝去心肝下酒,宰去腿股,作为肉干,人无全尸”。何大发一家及亲族被教民刘明钊等人杀死20人,其妻子何李氏甚至被轮奸致死。而在此次教案中与何李氏同样命运的尚有赵杨氏、刘赵氏和任李氏<sup>②</sup>。在此,我们看到了“爬行哺乳动物似的杀人冲动”<sup>[22]51</sup>。

财产破坏更恨不能烧光、抢光。1863年重庆教案,甚至把道辕与县衙之间教民店铺“挨户毁劫”,“如遇妇女,剥衣摘饰,违则刀棒频加”,闹事三日,“打毁七十余家”<sup>[2]1167,1191</sup>。1865年10月,据法国天主教川东主教范若瑟称,两年中,丰都、彭水和酉阳“三属教民被抢者二千七百余家”<sup>[2]1222</sup>。1868年酉阳教案,平民“被焚房屋八百三十二间”,教民“四百一十五间”,千余教民将尖山子等处60余里人家“所有钱谷牲畜衣物,一并抢去,并强奸该地逃避不及妇女数十人”<sup>[10]1118,1206-1207</sup>。1876年江北教案,迭毁“教民二百余家”,甚至掘地数尺,“或者是为了更好地发泄他们的仇恨,或者是为了在那里寻找财宝”<sup>③</sup>。同年涪州教案,一开始就“抢毁”教民200多家,后来,又“劫毁”州城教堂<sup>[7]1192</sup>。1886年重庆教案,2000中国教民的屋舍、店铺和农田被盗或破坏<sup>[17]160</sup>。余栋臣第一次起义,被焚教民人家,官方“报称一百数十家”,“教堂报称二百余家”<sup>[9]1572</sup>。余栋臣第二次起义,“有指一教中屋者赏钱五千,擒一在教人赏银四十两”,教会和教民财产损失愈400万美元<sup>④</sup>。1900年梁山教案,张春霆等人先对教民陈万来家放火,接着将陈万来及其两个儿媳和一名小孩劫至团长家,勒银1600两,陈万来允次日给银600两,遂被乱刀杀死<sup>[14]669</sup>。在涪州教案中,有人甚至“自带天主教书本,如将民家打抢,就将自带之书诬民习教”<sup>[7]1231</sup>。

这就难怪1876年江北教案,3000多教民逃亡

重庆<sup>⑤</sup>。余栋臣第二次起义,20000多教民无家可归<sup>[23]355</sup>。1868年酉阳教案,平民“逃往黔楚者数百家”<sup>[10]1224</sup>。难怪每一次大的教案都有一笔巨额赔偿,计1863年重庆教案150000两<sup>[2]1211</sup>,1865年酉阳教案80000两<sup>⑥</sup>,1868年酉阳教案30000两<sup>[10]1231,1234,1243</sup>,1873年黔江教案40000两<sup>[7]1088</sup>,1876年江北教案29000两<sup>[7]1350</sup>,同年涪州教案10000两<sup>[7]1352</sup>,1886年重庆教案261570两<sup>[9]1386</sup>,余栋臣第一次起义50000两<sup>[9]1580</sup>,余栋臣第二次起义1186100两<sup>[15]1325-1330</sup>,1907年开县教案21980两<sup>[24]纪闻</sup>。另外,1898年江北教案6400两<sup>[25]486</sup>,1900年梁山教案3000两<sup>[14]671</sup>。其中,余栋臣第二次起义是义和团运动前赔偿最多的一次教案<sup>[1]163</sup>。而江苏教案共赔偿约90000两<sup>[3]240</sup>,教案共赔偿5262758.26两<sup>[1]162</sup>。

### 五、动辄兵戎相见

白德理在致国内一位同行的信中这样描述1876年江北教案:“当在城内再不剩任何可以供糟塌和抢劫的东西时,暴徒们便分散在乡间。他们带着火枪和扛着飘扬的旗帜行进,就如同在正规的战争中一般。”<sup>[26]399</sup>而这样的场面在川东教案中并不鲜见。

两次大案以起义形式出现。余栋臣第一次起义,正如起义檄文所言:“大举龙水镇,沧州马跑场,……此呼彼应,义士来自东南西北,担粮馈响,妇女亦送箪食壶浆。军声大振,教民远逃。”<sup>[20]124</sup>余栋臣第二次起义,“止两日龙水镇成为兵山一座”<sup>[14]511</sup>,起义队伍和官军是一样的编制,军器有刀枪、长矛、抬枪、牛儿炮和猫儿炮,常驻营五六千人,随时“四出打教堂,借粮食”,部分人可回家生产,遇事鸣锣,立刻归队<sup>[20]135-136</sup>,百姓“献刀械者有之,纳银钱者有之”<sup>[14]520-522</sup>。1907年开县教案,“初以打教堂为名,数日裹胁众至数千”,对开县、万县和新宁县均形成攻城之势<sup>[18]966</sup>,实际上也是一次起义,张力《四川义和团运动》一书中就视为一次起义<sup>[27]118,125-130</sup>。

其他各大案也像打仗一样。1863年重庆教案,“兵勇痞匪约计千余,纷纷执械”<sup>[2]1167</sup>。1886年重庆教案,教绅罗元义雇100多人在家防守,“闻门外人声喧沸,即令各持刀棒跃出,不问情由,不分良莠,逢人乱杀,计伤毙十一命,受伤二十二人”<sup>[6]978</sup>。1876

②《教务教案档》第2辑第2册,第1204页,第1209页,第1120页,第1226页。其中,何大发一家遭遇,《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第354页。“杨贞廷”,有的地方如《教务教案档》第2辑第2册第1239页又作“杨楨庭”。

③《教务教案档》第3辑第2册,第1134页,第1115页。《清末教案》第4册,第398-399页。

④《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第522页。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9, p355.

⑤《教务教案档》第3辑第2册,第1350页,《教务教案档》第4辑第2册,第758页。

⑥《教务教案档》第2辑第2册,第1064页。不包括勒索张佩超20,000两,《教务教案档》第2辑第2册,第1165页。

年江北教案，“枪炮震地，旗戈遮日，……恍若寇临，例同大变”<sup>[7]1134</sup>。同年涪州教案，“匪数千，头裹红白巾，扬旗鸣炮，拥至州城”，劫毁教堂、教民房屋<sup>[7]1192</sup>。1865年酉阳教案，冯仕银、张佩超“督率数百人，各执军器旌旗枪炮”，掳掠城乡教民<sup>[2]1221</sup>。1868年酉阳教案，张佩超等人引贵州“号匪”数百人以为外援，筑营垒，覃纯卿亦引贵州“叛逆”李志高以及“徐虞周张各匪二千余人”以为外援，并自称统兵大元帅，购买火药，制造枪炮、军衣，“演操喊号”<sup>[10]1174,1117,1206,1224-1226,1205</sup>。1901年綦江教案，陈秀俊率众用炮轰开萧际云大门，并“持械抗官，轰伤练勇”<sup>[14]697,694</sup>。

川东教案中，民团成为中坚。1863年重庆教案，“兵勇痞匪约计千余，纷纷执械，移时道县围队，皆执枪刀齐集”<sup>[2]1167</sup>。1865年酉阳教案，被控主谋冯仕银，“连年办理该州团防总局事务”<sup>[10]1063</sup>，张佩超为营千总团首。1868年酉阳教案，李鸿章明确说是“教民团民互相”仇杀<sup>[10]1165</sup>，王文杰认为此次教案反教阵营加入“两种新份子：一是团民，一是黔匪”<sup>[28]54</sup>。1873年黔江教案反教领袖杨万象是团首，李渊树也是团局头目，所以，教会指控县令“桂衢亨主谋戕教局绅同谋首凶”<sup>[7]958</sup>。1876年江北教案，“四十八场痞党数千有奇，驻扎青草坝，排队进皇城”<sup>[7]1133</sup>。1886年重庆教案，“五十余团，约有三千余人”到白果树教堂“滋事”<sup>[6]988</sup>。1898年江北教案，“城乡团众齐至厅署，勒保已获之犯”<sup>[12]740</sup>。

所以，政府不得不频频调集军队弹压。1863年重庆教案发生后，成都将军崇实、四川总督骆秉章令蒋玉龙进驻重庆，而将保甲局所属之练勇800人调赴叙永一带。1868年酉阳教案发生后，除地方文武募勇调团，崇实又令裕字营前往，击退“外匪”，兜围打教头目刘幅<sup>[10]1115</sup>。1886年重庆教案，护理四川总督游智开调千名营勇到重庆巡防。余栋臣第一次起义，暑大足县令桂天培督团接仗，“右膀被炮轰击”<sup>[9]1068</sup>。余栋臣第二次起义，“竭一省之兵力，始得次第肃清”<sup>[12]810,910</sup>。1901年綦江案发，“两省兵星夜纷至”<sup>[29]兵事</sup>。1907年开县教案，“设非防军赴机迅速，其害岂可胜言”<sup>[18]967</sup>。

## 六、祸局未终，外交已起

美国学者费正清认为，从1860年到1900年，几百起教案，“其中至少有50起需要最高级外交当局来决”<sup>[3]188</sup>。而川东各大教案，甚至一些一般教案都要引起严重外交纠纷，所谓“祸局未终，外交已

起”<sup>[4]第1期</sup>，一点都不夸张。

1865年酉阳教案，还没到玛弼乐出事，法国公使柏尔德密就要求总理衙门转饬四川官员“速行查明”<sup>[2]1217</sup>。1886年重庆教案，10日内，英国公使华尔身“转达”总理衙门<sup>[6]933</sup>。余栋臣第一次起义一个月，法国公使李梅要求总理衙门“电查”<sup>[9]1449</sup>。1907年开县教案，不到10天，外务部致电护理四川总督赵尔丰，“顷准英使函称”，开县发生教案，“请查明声覆”<sup>[18]960</sup>。即如1895年万县教案，一个多月，英国公使欧格讷照会总理衙门，“万县地方出有教案”<sup>[9]1725</sup>。

据林文慧研究，福建教案发生后，多由领事与福建当局交涉，仅3起由公使向总理衙门交涉，即使教案最多的英国，亦仅半数由公使向总理衙门交涉<sup>[13]220</sup>。而川东教案，大案甚至一些一般案件皆由各国公使向总理衙门交涉。1863年重庆教案，柏尔德密陪同范若瑟到总理衙门“面诉”<sup>[2]1173</sup>。1865年酉阳教案，玛弼乐遇害后，法国临时代办伯洛内照会总理衙门“毋复稍延，特将此案严肃办结”<sup>[2]1220,1230</sup>。1868年酉阳教案，法国公使罗淑亚先提出四项要求，限期结案，接着又提出五项要求要挟，包括钦派大员办理此案，调四川总督吴棠“进京审问”<sup>[10]1086,1092</sup>。1873年黔江教案，法国公使热福理直指“桂衢亨主谋”，局绅同谋，并敦促总理衙门“函致各省大宪，饬令地方官平日先事预防，免致有川省等事”，署公使罗淑亚又迫使总理衙门允许参赞赫捷德入川查办<sup>⑤</sup>。1876年江北教案，法国公使白罗呢照会附送法国传教士常保禄诉状、被害教民姓名和被告人姓名以及范若瑟奏疏，声称“若不认真根究，诚恐别滋重案”。同年涪州教案，又函送教民赵泰顺诉状、教民受害清册以及范若瑟奏疏，以便总理衙门“明白川东情形”<sup>[7]1133,1191</sup>。1886年重庆教案，英国公使华尔身除及时“转达”总理衙门，又鉴于“此事确因重庆府考试武童而起”，要求“于他省居住洋人之处，倘遇类此考试之事，早行饬知地方官设法预先防范”<sup>[6]934</sup>。法国署公使恺自迹以“我国人民无故遭此一番扰害”，要求速饬地方官“迅即持平秉公完结”，法国公使恭思当指责“地方官竟将罗元义非法敲打甚重”<sup>[6]932,982</sup>。余栋臣第一次起义，法国署公使林椿除面递法国传教士彭若瑟报告，又照会“将匪等严为处治”<sup>[9]1455-1458</sup>。余栋臣第二次起义，法国公使毕盛两次到总理衙门称，“余蛮子事，总须兵力收功，若不用兵，断难了结”。法国外交部外交文书中仅华芳济被

⑤《教务教案档》第3辑第2册，第963页，《教务教案档》第3辑第1册，第65页，《教务教案档》第3辑第2册，第1039页。

劫持案的文件即有19件<sup>⑧</sup>。1898年江北教案(医馆案),虽然“美使始终和商,并无格外刁难”,毕竟还是出面了,“各国领事竞起为难”<sup>[12]741</sup>。1907年开县教案,英国公使要求“查明声覆”<sup>[18]960</sup>。甚至1895年万县教案,英国公使欧格讷照会总理衙门,要求将万县县令“严行申黜,以儆官邪”,并将打教之人“治以应得之罪”<sup>[9]1726</sup>。柏尔德密在交涉1865年酉阳教案时也提及1864年彭水教案。此外,法国副使艾嘉略也对1861年涪州、长寿等教案提出交涉<sup>[2]1131-1132</sup>。

教案发生后数次受到武力恫吓。1865年酉阳教案,伯洛内照会赤裸裸地宣称:“宜时记念前此西洋各国到中国用兵,皆因此等事端启衅,如将来再有此事,则本国仍用前法。”<sup>[2]1220</sup>1868年酉阳教案,罗淑亚突然闯进总理衙门,“声色俱厉,声言如不照四条办理,不日要回本国,一切俱由该国水师提督,自行主张”,后来,又以酉阳、遵义两案未结,罗列湖北、山西、河南以及广东未结各案,威胁“会同该国提督,携带兵船”,前赴江西、湖北和四川等处<sup>⑨</sup>。1876年江北教案,白罗呢照会总理衙门,望“转知四川大吏,令其明白,此案若起,四川大吏应明晓咸丰十年之和约,此宗责任非轻,况且贵国执政之责任亦非轻”<sup>[7]1127</sup>。余栋臣第二次起义,法国外交部长德尔卡塞告诉法国驻重庆领事哈士,“我与海军部长和共和国驻北京公使进行了协商,以确保您的安全以及侨民的安全”<sup>[26]18</sup>。1907年开县教案,“开万毗连,德英兵轮均到万”<sup>[18]960</sup>。所以,梧生“正告蜀人曰:仇教者非排外也,实揖外人而进之也”<sup>[4]</sup>。

据陈银昆统计,811起教案,1年内结案者占45.5%<sup>[1]154-155</sup>,时间越长,显示交涉越艰难,而川东教案,特别是大案,交涉时间普遍偏长。1863年重庆教案,1865年2月结案,交涉约两年<sup>[2]1210</sup>。1865年酉阳教案,1867年7月结案,交涉约两年<sup>[10]1064</sup>。1868年酉阳教案,1870年2月结案,交涉一年<sup>[10]1236</sup>。1873年黔江教案,1875年9月结案,交涉两年<sup>[7]1088</sup>。1876年江北教案、涪州教案,1878年6月同时结案,江北教案交涉两年,涪州教案因为晚两三个月开始,不到两年<sup>[7]1336</sup>。余栋臣第一次起义,1892年2月结案,交涉一年半<sup>⑩</sup>。余栋臣第二次起义,1899年11月结案,交涉一年半<sup>[15]1330</sup>。大案只有1886年重庆教案,年底结案,交涉时间不到半年。一些一般教案,如1895年万县教案,1896年4月结案,交涉8个月<sup>[15]1214</sup>。1864年丰都教案和彭水教案,至1866年9

月,崇实尚称或可了结<sup>[2]1252</sup>。所以,早在1867年11月,崇实即对总理衙门“密布苦衷”,称“川省教案之多,办理之难,有非他省可比者”,并以“重庆酉阳各案”为例加以说明<sup>[10]1072-1073</sup>。

川东教案呈如此态势,便不难理解“义和团,起川东”,义和团运动起川东,是余栋臣第二次起义,而非赵三多或朱红灯起义拉开义和团运动序幕<sup>[31]</sup>,所谓教案四川居多,尤以川东最多最严重,川东实教案高发区或曰重灾区,是一个负责任的结论,希望川东教案能得到应有的关注。

#### 参考文献:

- [1]陈银昆.清季民教冲突的量化分析[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1.
- [2]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教务教案档:第1辑第3册[R].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4.
- [3]王树槐.清季江苏省的教案[M]//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教案与反西教.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
- [4]梧生.排外与仇教[J].四川,1907(1).
- [5]李时岳.反洋教运动[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
- [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教务教案档:第4辑第2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6.
- [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教务教案档:第3辑第2册[R].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
- [8]胡齐畏.大足人民反洋教斗争[R]//大足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大足文史资料选辑:(二).印行时间不详.
- [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教务教案档:第5辑第3册[R].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7.
- [1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教务教案档:第2辑第2册[R].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4.
- [1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教务教案档:第4辑第1册[R].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6.
- [1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末教案:第2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8.
- [13]林文慧.季福建教案论述[M]//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教案与反西教.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
- [14]四川省档案馆.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⑧《教务教案档》第6辑第2册,第1288页,《清末教案》第4册,第12-21页。

⑨《教务教案档》第2辑第2册,第1095页,《教务教案档》第2辑第1册,第22页。

⑩《教务教案档》第5辑第3册,第1569页,结案后余栋臣继续活动数月。

- [1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教务教案档:第6辑第2册 [R].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0.
- [16] 郭鸿厚. 民国重修大足县志:卷四,大事记[M]. 时间不详.
- [17] MIRIAM LEVERING. Chungking Riot of 1886:Justice and Ideological Diversity [M. *Papers on China*,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1969.
- [1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 清末教案:第3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98.
- [19] 吕实强. 重庆教案[R]//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期下.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
- [20]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 近代史资料[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 [21] 重庆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重庆宗教[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0.
- [22] 小拉什·多兹尔. 仇恨的本质[M]. 王江,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 [23] KE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M].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9.
- [24] 广益丛报[N]. 光绪三十三年第五年第24期, 纪闻.
- [25] 刘吉西. 四川基督教[M]. 成都:巴蜀书社,1992.
- [2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 清末教案:第4册[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 [27] 张力. 四川义和团运动[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
- [28] 王文杰. 中国近世史上的教案[R]. 福州: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会,1947.
- [29] 戴纶喆. 民国四川綦江续志:卷二[R]. 兵事.
- [30] 费正清. 美国与中国[M]. 张理京,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 [31] 李重华. 余栋臣第二次起义与义和团运动的爆发[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130-137.

## A Study on the Motion State of Eastern Sichuan Missionary Cases

LI Chonghua

(Academy of Social and Sciences of Chongqing, Chongqing 400020, P. R. China)

**Abstract:** Most of the late Qing period missionary cases happened in Sichuan Province, especially in Eastern Sichuan. They lasted over the years and occurred everywhere in the country. They were often initiated by individual at first and responded by groups afterwards. People in the cases did not value the property and the life, and arms were frequently resorted to. Often before the cases ended, diplomacy had started. Study on the motion state of Eastern Sichuan missionary cases can give us further impression about the full view of the missionary cases in eastern Sichuan and its severity.

**Key words:** late Qing period; Eastern Sichuan missionary cases; the motion state

(责任编辑 彭建国)